

内蒙古文史研究通览

宗教卷

总主编 张建华 高晋湖

本卷主编 乔吉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内蒙古文史研究通览

宗教卷

总 主 编 张建华 薄音湖
本卷主编 乔 吉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内蒙古文史研究通览·宗教卷/乔吉主编. —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4.8

ISBN 978-7-5665-0308-4

I. ①内... II. ①乔... III. ①文史-内蒙古-文集 ②宗教史-内蒙古-文集 IV. ①
K292.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85875 号

书 名	内蒙古文史研究通览·宗教卷
主 编	乔 吉
责 任 编 辑	张华峰
封 面 设 计	敖全英
出 版	内 蒙 古 大 学 出 版 社 呼和浩特市昭乌达路 88 号(010010)
发 行	内蒙古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彩虹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42.5
字 数	1030 千
版 期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665-0308-4
定 价	2160.00 元(全十二册) 本册定价 180.00 元

声 明

我社已将出版《内蒙古文史研究通览》的使用情况备案到内蒙古自治区版权保护协会,因无法与作者取得联系,特委托内蒙古自治区版权保护协会代转作者稿酬,并依照《著作权法》相关规定及国家版权局制定的稿酬标准支付稿酬。

联系电话:0471—4967453

《内蒙古文史研究通览》编委会

主 任：布小林

副 主 任：张建华 冯永林 孔令勋
门百岁 马庆生 薄音湖

委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风雷 巴特尔 石玉平 包斯钦 乔 吉 刘国辰
李晓秋 连吉林 何远景 张久和 陈永志 明 锐
赵 英 莫久愚 鲍·包力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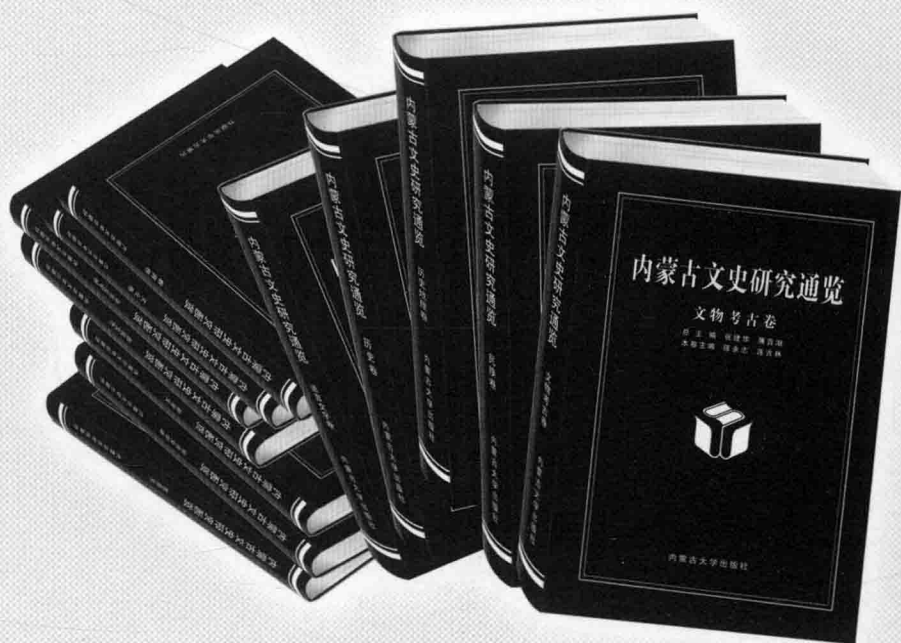
总 主 编：张建华 薄音湖

副总主编：孔令勋 何远景

本卷主编：乔 吉

编务主任：李鲁一 周绍慧

编 务：萨如拉 周秀峰 边保应 段瑞昕 冯丽丽 李 倩
门 洁 胡 静



《内蒙古文史研究通览》

- 《历史卷》 主 编：薄音湖
- 《历史地理卷》 主 编：莫久愚 副主编：于 永 索秀芬
- 《文物考古卷》 主 编：陈永志 连吉林 副主编：娜仁高娃
- 《语言文字卷》 主 编：鲍·包力高 达·巴特尔 副主编：王建莉
- 《民族卷》 主 编：张久和
- 《宗教卷》 主 编：乔 吉
- 《民俗卷》 主 编：刘国辰
- 《教育卷》 主 编：王风雷
- 《艺术卷》 主 编：冯永林 副主编：冯丽丽
- 《人物卷》 主 编：何远景 副主编：张 静 冯丽丽
- 《文学卷》 主 编：包斯钦 副主编：潘彩霞
- 《文化卷》 主 编：明 锐 副主编：何砺砢

序

中华文化是多元文化的统一,作为其重要一元的草原文化,是我国北方游牧民族适应草原生态环境,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创造和积累下来的一种文化形态。随着大量的考古发现和对历史文献的深入研究,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草原文化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源流,三种文化的相互碰撞、交流、融合,共同造就了灿烂的中华文明。

内蒙古是草原文化的主要发祥地。曾经生活在这里的匈奴、鲜卑、契丹、女真、蒙古等诸多民族,共同创造了丰富多彩的草原文化,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这里有大约5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的大窑文化、萨拉乌苏文化遗址,有1万年前的扎赉诺尔人。新石器时代的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等人类文明结晶,拓展了中华文化起源,把中华文明的开端推向更为久远的历史,被称为“中华文明的曙光”。人类步入文明社会后,蒙古高原的统一,彻底打破了区域之间的封闭,打破了原有民族、部族的格局,结束了蒙古高原数千年民族、部族纷争的历史,在建立政权、创造文字、建设都市、繁荣文学艺术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非凡的成就,涌现出了一批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和文学艺术家。作为中华文化重要源流的草原文化,在不断地为中华民族的进步和中华文明的繁荣提供滋养的同时,对世界文化的发展也产生了极其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时至今日依然生机勃勃,独具魅力。

马克思曾经说过,“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它反映人类改造自然、改造社会、不断推进文明进步的历程。今天的世界是过去世界的继续和发展,如果隔断历史,就不能全面地、正确地理解现实和展望未来。”在当今文化与经济相互交融、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与作用越来越突显的时代,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对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和构建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存史的目的在于资政,在于借鉴和运用历史经验推动社会进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形成、发展及其盛衰兴亡的真实记录,是前人各种知识、经验和智慧的总汇。要重视对历史的学习和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与运用。”内蒙古自治区文史研究馆顺应时代和社会需求,组织协调各方面的力量和资源,以科学严谨的态度,历时三年之久,编纂出了一套共计1000余万字、7万余条文献目录的《内蒙古文史研究通览》。全套丛书共12个分卷,集辛亥革命以来国内外众多学者研究成果之大成,涵盖了历史、教育、地理、民族、宗教、民俗、文化、艺术、人物等诸多方面,为社会文史研究工作者和广大读者提供了一部内容丰富、翔实的史料。在这套详前史之阔略,补今史之空白的卷帙浩繁的《内蒙古文史研究通览》付梓之际,谨向参与编纂的学者表示祝贺和敬意。

80 多年前梁启超先生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自序》中说,“我国史界浩如烟海之资料,苟无法以整理之耶,则诚如一堆瓦砾,只觉其可厌;苟有法以整理之耶,则如在矿之金,采之不竭,学者任研治其一部分,皆可以名家,而其贡献于世界者皆可以极大。”加强对草原文化的挖掘、整理和研究,传承和弘扬优秀文化,推动社会文明的进步,将是我们孜孜不倦共同追求的事业。

美丽和谐的内蒙古,不仅是一个经济发达的内蒙古,也必定是一个文化繁荣的内蒙古。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 布小林

2013 年 7 月

前言

内蒙古自治区位于中华版图的正北方,国土面积 118 万平方公里,东西横跨东北、华北、西北,毗邻八个省区,北部与蒙古、俄罗斯两国接壤。千百年来,她以博大的胸怀,造化万物,包容百态,辈出英才,力鼎时代,以其中北方民族特有的传承演进方式,创造了地区人类历史发展的文化与文明。

纵观辛亥革命以来国内外文史研究成果,内蒙古所占的比重与影响,堪称厚重久远。时至今日,草原文化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正在携手铸就着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恢宏。更应值得关注的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文弘世道,史为国鉴之道理,越来越深入人心,借鉴和运用历史经验把握国家和自己的命运的取向,已成为推动当今社会进步的一种先进生产力。说古论今,引经据典等不凡其例,可谓存史资政。

文史研究馆作为政府文史咨询职能部门,理应为之需求提供服务。于是,我们从 2011 年开始,着手收集整理起迄百年来专家学者发表在国内外期刊、杂志上研究内蒙古地区人文社科类的论文和著述,编纂了这部《内蒙古文史研究通览》,旨在为人们进一步深入研究内蒙古历史提供方便。全书共分设历史、文物考古、历史地理、民族、宗教、文化、教育、艺术、文学、语言文字、民俗、人物等十二卷,共计 1000 余万字。

历史卷:选取辛亥革命以来发表在国内外期刊、杂志上关于内蒙古地区历史方面的研究成果。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地理、民族、民俗等方面。

文物考古卷:选取辛亥革命以来发表在国内外期刊、杂志上关于内蒙古地区文物考古方面的研究成果。其内容涉及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辽西夏金元、明清等时期内蒙古大地上的出土文物、遗址考古等方面。

历史地理卷:选取辛亥革命以来发表在国内外期刊、杂志上关于内蒙古地区历史地理方面的研究成果。其内容涉及道路交通地理、城市城镇(城址)地理、军事地理(长城、关隘、驻防设置)等方面。

民族卷:选取辛亥革命以来发表在国内外期刊、杂志上关于内蒙古地区民族方面的研究成果。其内容涉及曾经在内蒙古地区生产生活、繁衍生息的北方各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融合演进的过程以及推动近代以来民族关系发展的政策、制度等方面。

宗教卷:选取辛亥革命以来发表在国内外期刊、杂志上关于内蒙古地区宗教方面的研究成果。其内容涉及蒙古族的古老宗教——萨满教,大蒙古国时期的藏传佛教、汉传佛教、道教全真派以及外传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元朝时期佛事活动、佛经翻译与寺庙等方面。

文化卷:选取辛亥革命以来发表在国内外期刊、杂志上关于内蒙古地区文化方面的研究成果。其内容涉及广义文化、狭义文化以及对内蒙古地区文化成果评述等方面。

教育卷:选取辛亥革命以来发表在国内外期刊、杂志上关于内蒙古地区教育方面的研究成果。其内容涉及科举制度、官学教育、私学教育、幼儿教育、民族高等教育、教育制度演变、书院、学校创办等方面。

艺术卷:选取辛亥革命以来发表在国内外期刊、杂志上关于内蒙古地区艺术方面的研究成果。其内容涉及传统与现代艺术领域里的诸多方面。

文学卷:选取辛亥革命以来发表在国内外期刊、杂志上关于内蒙古地区文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其内容涉及小说、散文、诗歌、史诗、神话传说、民间故事、乌力格尔等方面。

语言文字卷:选取辛亥革命以来发表在国内外期刊、杂志上关于内蒙古地区语言文字方面的研究成果。其内容涉及北方少数民族语言研究、蒙古方言土语研究、蒙古语语音、语义、语法、词汇等方面。

民俗卷:选取辛亥革命以来发表在国内外期刊、杂志上关于内蒙古地区民俗方面的研究成果。其内容涉及有史以来繁衍生息于南起长城、北抵大漠、东达兴安岭、西越贺兰山的苍茫大地上,举凡衣食住行、乡社生产、市井商贸、宗族村落、人生仪礼、游戏娱乐等方面。

人物卷:选取辛亥革命以来发表在国内外期刊、杂志上关于为推动和影响内蒙古发展做出杰出贡献的历史人物方面的研究成果。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教育等方面。

在编纂上述十二卷的同时,我们还编辑了《内蒙古文史研究通览》附录卷,纳入通览体系,以目录的形式收录未选入上述十二卷文章的名称、作者与出处。

《内蒙古文史研究通览》计划在“十二五”期间完成。2013年先期出版六卷。在编纂出版过程中,我们力图通览,求所精华,注重学术,尊重历史,面向未来。但由于时间紧迫,加之水平有限,在通览结构划分上、体例确定上、目录和文章的选辑上以及文稿校对上,难免存在疏漏和不足,恳请批评指正。

《内蒙古文史研究通览》的编辑出版,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在此,我谨代表内蒙古文史研究馆向参与编辑出版此书的同仁表示感谢,向所有提供文章的作者表示感谢。

我们热爱内蒙古,不仅仅是因为生于斯、长于斯,更因为这里蕴藏着富集的物质资源与丰厚的文化宝藏。文史研究馆所能做的,并能做到、做好的事情,就是让这些丰厚的文化宝藏再现光辉,让更多的人了解内蒙古、了解内蒙古文史研究百年来的发展与成就,并为之所用。

内蒙古自治区文史研究馆馆长 张建华

2013年6月10日

蒙古人与宗教

蒙古人固有的宗教信仰——“萨满教”

13 世纪蒙古人的文献,向我们展示了蒙古人所信仰的一种宗教信仰及其体系。这就是蒙古人接触到其他民族之前,他们所固有的宗教信仰即北亚众多游牧和狩猎民族共同信仰的,并在他们中间广为流传的一种对于自然崇拜的泛灵论的古老的宗教——萨满教。

蒙古人所信仰的萨满教,并无教名,现代学者一般称之为萨满教(shamanism),蒙古人称之为“孛额”(《蒙古秘史》汉译为“师公”),并分为最高的“孛额”和一般的“孛额”。最高的“孛额”叫“帖卜腾格里”(通天巫),一般的“孛额”,男的叫“孛额”,女的叫“伊都罕”。

蒙古人的最古的历史名著《蒙古秘史》开篇就说,成吉思汗的根源是“奉天命而降生的‘苍色狼’和‘惨白色鹿’的后裔”。成吉思汗始祖的这段传说,反映了成吉思汗远祖对过去森林狩猎时代鹿祖图腾观念的承袭以及后来进入草原游牧时代对狼祖图腾观念的承袭。鹿祖传说为鲜卑、室韦森林狩猎部落鹿图腾观念的反映。关于狼祖传说,在许多北方游牧部落的传说中都得到反映,如《史记·达宛列传》载有乌孙王昆莫出生后被弃于野外时“狼往乳之”养大的故事;《汉书》亦有大致相同的故事;《魏书·高车传》有高车始祖为狼的故事;《周书·突厥传》又有突厥始祖母为狼的故事。我们知道,成吉思汗远祖原为山林狩猎人。在最早时蒙古人并不是草原上的一个种族,而是一个生活在森林山区的人民。同时这些森林部落是处在萨满巫师特别影响之下的部落。波斯史家拉施德也认为,在古代蒙古人居住的北部森林地区即巴儿忽地区,又称为巴儿忽真·脱窟木,那里萨满最多。苍狼、白鹿为蒙古人的祖先传说,正是蒙古人从森林迁到草原,转变为草原游牧人后既继承了狩猎人祖先母系始祖时代的鹿图腾观念,后又从他们的先人那里汲取了以苍色为神圣的观念和苍色狼为其祖先传说。

我们从 13 世纪蒙古人的文献和口头传说中完全可以观察到,在当时的蒙古人中,对图腾的崇拜、对偶像的崇拜及祖先的崇拜是混为一体的。在蒙古人看来,祖先这一概念既包括家庭的祖先、死者的亡灵,又包括氏族和部落的领袖人物及图腾始祖,他们既是先辈,又是始祖和部落的保护神,同时还是被崇拜的偶像。

到了 12—13 世纪时,蒙古人萨满信仰的诸神灵不仅已经经历并完成了与上述古代诸民

族的“苍狼”与“白鹿”为始祖的古代传说,而且已经成为包括这一始祖传说演变而来的诸种神灵的信仰者。这正是蒙古人从森林迁到草原后不仅继承了草原主要民族,如突厥人、乌桓人、鲜卑人、契丹人等民族所信奉的众多神灵,甚至还有外来各种宗教,比如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影响所造成的较为复杂的信仰的演变过程。蒙古人迁入草原后,牲畜是蒙古人生活的主要依靠和基本资料,所以蒙古人从古至今常常把家畜神化。将牲畜偶像化加以崇拜的典型例子就是蒙古人对马的崇拜。蒙古人从古讲到今的《成吉思汗两匹骏马的故事》中的两匹骏马在蒙古人的眼里仍然视以神物来供奉。蒙古人除了马之外,还把牛、山羊、鹿、天鹅、鱼、熊、狼、貂等等也当成神物来供奉。

萨满信仰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基于人们无法理解自然界的各种现象,对自然力的压迫,无法抗争,迫使自己依赖,人们所常见的在那茫茫大地之上,万里长空的永生苍天、暴风、骤雨、闪电、雷霆以及日月、星辰、高山、森林、湖泊、江河、水火等等也很容易被认为是有神灵,力图通过崇拜这些神灵来改善自然和人之间的关系。这种古老的萨满信仰正是我们所说的“萨满信仰”成为今天的学者们所说的“萨满教”的产生、演变和发展过程。对这一过程的具体体现,我们通过成吉思汗及其所建立的大蒙古国的宗教信仰活动为其实证。

在蒙古人建立的国家中,我们从13世纪的文献中可以看到,成吉思汗在统一蒙古诸部萨满仍然像在过去的氏族部落中一样,享有崇高的威望。我们知道,拥护成吉思汗即位的有三位权势的萨满首领即巴阿邻氏族的豁儿赤和同族的兀孙老人,还有号称“帖卜腾格里”(通天巫)的阔阔出。其中前者是早在1189年成吉思汗首次称汗前,离开扎木合投奔了帖木真(成吉思汗),并向他预告了上天让帖木真当国主的神告。当时帖木真为利用萨满巫师对百姓的影响,答应他的要求:封他为万户长,自选美女等。与豁儿赤同族的兀孙老人,也是成吉思汗首次称汗前,离开扎木合投奔了帖木真的萨满巫师,多年忠贞不贰,驯顺地为成吉思汗效力。成吉思汗称帝后,立兀孙老人为萨满教“别乞”,让他穿白衣、骑白马,让他坐在高座上主持祭祀,选算年月吉凶。阔阔出是在诸勋旧中最受成吉思汗敬重的蒙力克之子。史书说他,能飞上天,能预言未来,地位不亚于成吉思汗。1206年,成吉思汗即大蒙古国汗位时,就是这位阔阔出代表天神,当众宣布帖木真为成吉思汗的。

纵观成吉思汗时代的蒙古社会,当时萨满并不是一个普通的萨满,而是在国家统治阶层中的重要人物。萨满的领袖们已经成为专职人员即巫师,并且掌握各种祭祀仪式,成为部落联盟中的神权代表、国家的神职人员,其地位相当高。

据法国旅行家鲁布鲁克(亦写卢布鲁克,Cuillaume de Rubruquis,约1215—1270)的记载,在蒙哥汗时代,萨满的“人数很多,总有一个头目,好像教皇。他始终把自己的住所安置在蒙哥汗的大宫室前,离它有一投石之遥。……运载偶像的车辆就是在他的监护下。别的人(指其他萨满)跟在鞑耳朵之后制定给他们的位置上。相信占卜术的人从世上各地去找他们。其中一些人懂得点天文,特别是头目。同时他们向人们预报日月蚀。……他们预报做任何一件事的吉凶,因此若无他们的允许,蒙古人就不调集军队或进行战争。……送往宫廷的东西,他们都要从火的中间通过,从中留下他们的分子。……5月9日,他们集中所有的白色(姆)马,把他们献祭。……他们还在孩子出生时便被叫去预报他的前程。有人生病时也找他们。他们念着咒文,并且说明这是天生的病,还是因巫术所致。……其中有些人(萨满)呼唤鬼神,晚上在家里聚集一群希望得到鬼神回答的人。他们在屋的中央放上煮好的肉,请神的萨满开始念咒,把手里的鼓拼命往地上碰。最后他进入疯狂状态,让人把他自

己捆绑起来。这时鬼神从暗中入内,给他吃肉,他就作回答。”(道森编,吕浦译,周良宵注《出使蒙古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这位西方旅行家的当时记录,可以说是相当全面地反映了当时蒙古萨满教的权利和特点。从这一点我们不难看出随着成吉思汗对萨满的神化活动,包括成吉思汗本人及其大蒙古国的一切宗教活动大概都未能离开过萨满教的信仰。

在蒙古人的萨满教的诸神信仰中,一个很重要的位置是属于“腾格里”(天)的。12—13世纪的蒙古人对天的崇拜,也同样无疑起源于遥远的古代。当时,我们今天所称之为阿尔泰语系的民族里有一个共同的词汇——“腾格里”(tngri),这一术语就是其证。这个术语在突厥民族和蒙古人中广泛使用。据蒙古人的“祭天”文献,首先,天并不是具有人性的东西,他们是作为自然现象本身来崇拜它:世间万物都是生存在“天苍苍,野茫茫”的大草原之上。在这一望无际的广大草原上,使人最容易感觉伟大的就是覆盖在这茫茫大地之上,万里长空的永生苍天,因此,在蒙古萨满教的巫师们的词汇里称其为“长生天”(mǒngke tngri)。其次,“天”又被认为是赐予生命的男性神灵,所以蒙古人自古以来也称之为“天父”(ečige tngri)。

到成吉思汗时代,蒙古人关于“长生天”的思想达到了尽善尽美的地步,并且有了鲜明的社会政治色彩。我们依据蒙古人最古老的史籍经典所记资料来看,就是以“上天奉命”(degere tngri - ece jayayatu)一句开始讲述了成吉思汗一系祖先是“上天奉命而降生”的。成吉思汗即大汗位也是由能知天意的最高“孛额”们,把上天的意思转达给他,“要帖木真作国家之主”后才即大位的。成吉思汗本人,是非常敬畏天的。据蒙古人的古代文献,如《蒙古秘史》等的记载,成吉思汗一生的征战、胜利、脱险、甚至挫折都与长生天的重要作用有关。

古代蒙古人认为,天能看到人的一切行为和意图,人什么时候也逃脱不了天的审判。蒙古人自古以来有个口头禅,他们预测某一件事的结果好与坏时,总是说:“天哪,你审判吧!”(tngri mede!)或者说:“天哪,你恩赐吧!”(tngri örüsü - e!)如有什么事情违背了天的意志,它就会发怒,人就会有灾难。

据现代研究家们根据蒙古人的萨满祝词的各种手稿进行分析,举出众多“腾格里”,并指出这些“腾格里”都有其各自独到的职能和特点。然而,文献资料显示,在成吉思汗时代萨满教的众多神灵上,出现了一位至高无上的天神——“长生天”。这就是在《蒙古秘史》中出现的“mǒngke tngri”以及后来的元代的汉文书简、法律条令、牌子、碑文和墓志铭中译法为“长生天”的至高的天神。

在大蒙古国里有巨大影响的萨满教始终为加强可汗的权利服务成为实事。长生天和可汗并列,并与可汗的权利紧紧结合在一起了。在大蒙古国乃至元代的所有圣旨、懿旨、令旨中出现的“长生天的气力里,可汗的大福荫护助里”等起首语,当是其证。

除了“长生天”这一最高神以外,仅次于“长生天”的崇拜对象,就是“大地”(eke etügen)。古代蒙古人按照自己的神权观点,大地是排在长生天之后居第二位的神。古代蒙古人把天视作自然界的阳性根源,将地视作阴性的根源,认为天赋予人们以生命,地赋予人们以形体。因此蒙古人至今为止仍然有“父亲天,母亲地”之说的原因就在于此。据《蒙古秘史》记载,当成吉思汗借助客列亦惕部王汗和扎答兰部札木合兵力击溃篾儿乞惕部后,他感谢王汗和札木合两人,说道:“由于得到我的汗父和札木合安答两人的协助,靠天地增添力量,被有威势的苍天(erketü tngri)所眷顾,被母亲大地(eke etügen)所顾及,我们已报男子汉之仇于篾儿乞惕百姓,……”(113节)。我们从《蒙古秘史》中还发现,大蒙古国时期萨满

教的巫师们已经将“天地”这两个概念并列起来使用的举例：当豁儿赤离开札木合投奔成吉思汗时带来的神乎其神的吉兆即帖木真必将得到汗位时说：“天地商量好，让帖木真当国主，我把国家载来了！这是札阿邻（汉文旁译为‘神告’）指示我，使我亲眼目睹到的。”同时还警告成吉思汗“不论我说什么话，你都要听我的”。（121节）

此外，当时蒙古人随着大地的崇拜也对大地的组成部分——“有神灵的”山、水等自然界献于以崇拜并进行祭奠活动。据《蒙古秘史》，13世纪成吉思汗“对不儿罕·合勒敦山，每天早晨要祭祀，每天都要祝祷！我的子子孙孙，都要铭记不忘！”的指令的同时，自己“面向太阳，把腰带挂在颈上，把帽子拖在手里，以[另一]手捶胸，面对太阳跪拜九次，洒奠而祝祷”（103节）的记载。对山的祭祀，主要以某一地区有一座神圣的山为主要对象。当时成吉思汗的乞颜部以不儿罕·合勒敦山为其祭祀的有神灵的山。水和火也是敬拜对象，因为它们都是圣洁的。不能把污物放入水火之中，这是成吉思汗的大“札萨”的内容之一。据许多当时西方使者谒见成吉思汗时，都要从火上经过之事，是用火来除其不洁。日月也是蒙古人的敬拜对象。（81节）这些是蒙古固有的萨满教信仰多神的反映。

现代蒙古民间，蒙古人仍然一如既往，对天地山河和火以及地方神灵敬拜。但是随着佛教的传入喇嘛们代替了巫师，给神灵们穿上了佛教的外衣，萨满教渐渐退缩，这是后来的事，但是事实。

蒙古萨满教的渐渐退缩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从历史观考察，随着大蒙古国的对外征服战争，13世纪的蒙古人面对许多外族的文化和新奇而各种各样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不能不产生爱慕，甚至采纳的意识和行动。其中对外来的宗教及其派别，当然也不例外。这一过程中，蒙古人与中原地区和西藏地区佛教的接触，对蒙古人来说，改变其固有的萨满教信仰，以及后来整个蒙古人变成西藏佛教的忠实信仰者，是有直接关系的。

从宗教观考察，我们不能忽略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就蒙古人所信仰的萨满教本身而言，它是一种以“天”即“长生天”为至高无上的神灵来敬拜的宗教。然而众所周知，在世界上的任何宗教中，没有一个宗教是不信仰天而反对天的。从萨满教的信仰来看，它是一个多神的泛灵论的宗教，不具有对其他宗教的排他性。

从统治阶层的政策来看，成吉思汗本人是崇信萨满教的，但他在对外征服中对各种宗教所采取的是兼容并蓄，一律加以保护的宽容政策。这一点我们从大蒙古国的成吉思汗和窝阔台汗时期的蒙古文、八思巴文、汉文等文字的圣旨以及整个元代诸汗的圣旨中都可以得到明确的实证。通过这些圣旨，蒙古统治者向外来的各种宗教发出了宽容、平等对待的政策。在蒙古统治阶级的这种政策的背景下，首先汉地佛教和西藏佛教进入了大蒙古国及元朝宫廷，后来西藏佛教成为国教，原来占统治地位的萨满教渐渐走向了退缩的道路。

但是，我们对蒙古人的萨满教的历史演变中需要指出的一个问题是，在元代虽然西藏佛教得到很大发展，同时成为国教，然而在整个元代西藏佛教的传播范围还仅限于上层统治阶级以及宫廷的活动。于是萨满教的活动不得不退缩到草原上，成为蒙古民间宗教而存在。

元朝灭亡之后，一切外来宗教都渐渐消失，这时已经退缩的萨满教又乘机成为蒙古人的普遍信仰也是后来的历史事实。

蒙古人与佛教的接触

公元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后,随着蒙古军事势力的不断扩张,蒙古人面对了越来越多的外族文化和宗教。蒙古人第一个接触的外来宗教似乎是佛教。大蒙古国时期佛教从两条途径与蒙古人发生接触,一条是西夏国,另一条是金国。

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时,其邻近的西夏,已经是佛教盛行的国家。西夏人吸收中原汉地佛教外,对吐蕃(西藏)佛教也采取兼收并蓄,中期以后更加迅速地从吐蕃吸收了丰富的营养。西藏佛教噶玛噶举和萨迦两派在西夏佛教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公元1205年—1227年,是西夏与蒙古通过战争接触的时期。这种接触不能不反映到蒙古人军事和经济领域中去。当时西夏人制造了一种小型的旋转式野战炮,固定在驼峰上,使其成为机动火炮。蒙古人为使用此炮,从西夏掠夺了很多骆驼。此外,蒙古人还从西夏人那里学到了具有代表政权权威的令牌和牌符制度,成吉思汗选择宫廷乐礼时,又以西夏音乐为宫廷音乐等等。这些都是蒙古人采用西夏文化的明显例证。

由于与蒙古的频繁交往以及西藏佛教的突飞猛进的发展,西夏成为西藏文化与北方草原民族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当时在西夏活动的西藏僧人北上蒙古草原,开创了西藏与蒙古交往的先河,为后来的元朝西藏佛教的发展打下了基础。据藏文史籍《贤哲喜宴》(1564)记载,西藏察巴噶举派的创始人向察巴·尊追扎(1123—1194)的弟子藏巴东库哇等七人经过西夏到了大蒙古国,在山间修行,后被蒙古军派充牧羊人。有一次天降冰雹暴雨,周围的羊群尽死,只有他因为作法祈祷本尊,所在之处未下冰雹,羊只未损失。蒙古人询问其原因,因言语不同,他用手指天,因此被蒙古人称为能管天的有福德之人。成吉思汗即位不久,听到他的事,立即召见他。他在西夏住过,熟悉西夏情形,衣着又与西夏人一样,所以受到处心积虑要消灭西夏的大汗的重视。藏巴东库哇见到成吉思汗,向他讲述佛经,使成吉思汗对佛教有所了解,但是由于萨满和也里可温的嫉妒,离开蒙古回到西夏。1227年成吉思汗最终发动了对西夏的战争,蒙古军摧毁了许多佛寺,藏巴东库哇又到成吉思汗身边请求,被成吉思汗尊为“告天长老”,成吉思汗幼子拖雷之妻赛因额客(即唆鲁禾帖尼夫人)母子担当他的施主。他还通过翻译向成吉思汗讲说佛教因果关系,劝说成吉思汗信奉佛法,因此成吉思汗发布了免除僧人差税兵役,不准在寺院驻兵的诏书,还修复了西夏地区的一些寺院。

窝阔台即位后不久,藏巴东库哇去世,临终时遗言要蒙古人迎请他的师兄弟贡塘巴。贡塘巴到蒙古后被蒙古人奉为上师。后来忽必烈一家与察巴噶举派有特殊关系,对察巴噶举派特别敬重。

藏文史籍《安多政教史》也有类似的记载。青海地区有一位叫“斯纳格西”的著名学者。他从西藏带了三位高僧作为随从前往蒙古地区见成吉思汗,在他面前显示了作法降雨,同时让大雨停下来等各种奇迹,受到成吉思汗的敬重。由此可见,大蒙古国时期西藏僧人经过西夏北上蒙古,在蒙古地区传播佛教,并得到蒙古汗廷的敬重,是有根据的。

在汉地佛教高僧和通过西夏北上的西藏僧人,究竟哪一个先与蒙古人接触,其具体年代我们似乎难以解答,然而就现存史料而言,金国的禅宗似乎在先,但是我们有必要指出的是,

西夏开创了西藏与蒙古交往的先河,并为后来元朝藏传佛教的发展打下了基础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公元1211年成吉思汗开始进攻金国,当时汉地佛教禅宗在宋朝佛教的影响下在金国很盛行。1214年开始,禅宗著名和尚海云法师印简(1202—1257)和其师中观沼公见到蒙古皇子。1219年,海云和其师中观二人,由蒙古的汉军将领史天泽、李守中等举荐,荐到了当时在华北的蒙古军统帅太师国王木华黎,并由木华黎的推荐从成吉思汗得到“告天人”的尊号,并指派他们掌管中原佛教。当时在西征启程中的成吉思汗给木华黎的圣旨中说:“你使人来说的老长老、小长老实是告天的人,好与衣粮养活着,教作头儿,多收拾。那般人在意告天,不拣阿谁,休欺负。交达尔罕行者。”其中我们觉得有趣的是,成吉思汗将海云等人视为蒙古固有的萨满教的巫师“帖卜·腾格里”(告天人),并从这一概念出发,指派他们掌管中原佛教之事。当年,成吉思汗在西征途中又传诏,命海云及其师中观统汉地僧人,免其差发。于是海云等从木华黎处得到汉式法号“寂照英悟大师,所需皆官给”。(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大正大藏经卷三十二)以上是成吉思汗时期汉地佛教与蒙古发生联系的最早记录,说明汉地佛教与蒙古政权的正式接触似乎是在西藏佛教传入蒙古之前,并且得到了成吉思汗的敬重。

中观去世后其门徒海云法师个人的活动以及中原地区的佛教,也不断得到蒙古汗廷的重视和保护。成吉思汗以后,在窝阔台、贵由、蒙哥汗和忽必烈王子时期,海云“为天下禅宗之首”,地位更为显赫。

“卯年(1231)十一月受合汗皇帝(窝阔台)宣赐。”定宗贵由汗即位后,海云于1247年(定宗二年)应太子哈剌赤之请入和林延居太平兴国禅寺。贵由汗曾“颁诏命师统僧,赐白金万两”;1251年蒙哥汗即位,命“以僧海云掌释教事”。海运在大蒙古国时期可以说是一个与汗廷来往密切并主管蒙古汗廷佛教事物的代表人物。

除了海云之外,原在金朝极负盛名的禅宗五家之一的曹洞宗僧人万松行秀的弟子雪廷富裕(1203—1275),曾受贵由汗之命,居漠北和林兴国寺。蒙哥汗时期在和林大建佛寺,以富裕主其事。忽必烈即位后,富裕的地位更加显赫,“命总教门事”。看来,13世纪上半期在大蒙古国汗廷,汉地佛教中的临济宗和曹洞宗势力最盛,海云法师和万松行秀的弟子们的地位崇高。

除了中原地区以外,西域的一些喇嘛也正在蒙古汗廷活动。据汉文史料记载,有一位喀什米尔的僧人叫那摩。太宗窝阔台时期从西域喀什米尔与其兄一起投奔蒙古,太宗礼遇之,定宗贵由师事那摩。1252年蒙哥汗曾封他为国师,授玉印,总天下释教,地位高于海云,并取代了他的位置,从此海云就退出了历史舞台。

1258年,以蒙哥汗的诏令,由忽必烈召集了佛教与道教的代表人物展开的大辩论。这次辩论,史称“佛道之争”。那摩是当时参加辩论的佛教界居第一位的人物。这场辩论以那摩、八思巴为主要代表的佛家的胜利而告终。那摩等人极力支持汉地僧人,贬抑道教,使自成吉思汗优礼道士长春真人丘处机以来,道家在汉地的优势大受挫折,为日后元朝诸帝信奉佛教奠定了基础。

据《佛祖历代通载》所记海云法师传,海云于壬寅年(1242)应忽必烈大王之请到忽必烈宫帐讲述佛道之事。其中有一段记载说:“壬寅忽必烈大王请师赴帐下,问佛法大意。师初示以人天因果之教,次以种种法要,开其心地。王生信心,求授菩提心戒。……王又问:‘三

教何教为尊?何法最胜?何人为上?’师曰:‘诸圣之中,唯僧无诈,故三教之中,佛教居其上,古来之式也。’……将别,王问:‘佛法此去如何受持?’师曰:‘信心难生,善心难发,今已发生,务要护持,……一切时中,常行方便,皆佛法也。’”(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大正大藏经卷四十九)从这段记事,我们可以看出此时的忽必烈对于佛教有了初步的兴趣和信心,产生了信仰的萌芽。同时我们通过忽必烈的宗教活动,这次与海云谈佛道,不仅对日后中原佛教的兴衰攸关,且成为忽必烈后来皈依西藏佛教的重要原因。

蒙古人与西藏佛教

西藏佛教正式传入蒙古地区,一般认为,肇端于窝阔台汗的第三子阔端(1206—1251)对西藏的军事占领的结果有关。阔端从1239年开始兵锋转指西藏。1244年旧历八月三十日皇子阔端据其在征服西藏战争中的蒙古指挥官的推荐,向西藏佛教的一支萨迦派首领萨迦班智达(简称萨班)发出了一份邀请信。通过藏蒙文献,我们都能读到这份“邀请信”的原文,其内容基本一致。阔端之召请萨班,并不表明他对西藏佛教产生了什么信仰,其主要目的在于通过萨迦派的首领,让他代表各地方势力与自己谈判西藏归顺蒙古的问题。但是除了这个主要目的以外,也还有宗教上的原因,就是阔端确实想使萨班到达凉州一带起佛教领袖的作用,发展佛教,帮助自己统治原来的西夏故地,与阔端的谈判结束后,萨班便留在蒙古地方发展佛教。

藏历火马年(1246)八月萨班到凉州,次年会见阔端。据西藏方面的材料记载,阔端与萨班会见后,“阔端甚喜,谈论了很多教法,在原先黎域(今甘肃裕固县)诸大德向阔端介绍佛教的基础上,使阔端领会了佛教之教义。因此阔端十分高兴,下令今后也里可温和萨满不能坐在上首,祈愿时首先有佛教僧人祈愿。由此在蒙古地方佛教出家僧人之地位受到重视。”(《萨迦世袭史》,拉萨,1989,汉文版)从此,萨班成为阔端的上师,并留在蒙古地方“弘扬佛法”。这是蒙古与西藏萨迦派建立最早的联系。

阔端对西藏萨迦僧人的优宠,引起了起初从汉地佛教禅宗那里接受影响,并且以崇信佛教的忽必烈大王的极大兴趣。据西藏《红史》《汉藏史集》等记载,公元1251年夏,忽必烈驻军六盘山(在今甘肃省东部),派人到凉州迎请萨班,当时萨班“因年老未去”。于是萨班的侄子八思巴(1235—1280)在阔端之子蒙哥都的陪同下,赴六盘山会见忽必烈。忽必烈将八思巴留下,与八思巴结为施主与福田,尊八思巴为上师。

1254年,忽必烈颁给了已经继承了萨迦派第五祖的八思巴一份很长的诏书。这就是萨迦派史籍和蒙文佛教文献中常称道的藏文称之为《vja sa bod yig ma》(藏文诏书),当代藏学家们译成《优礼僧人诏书》。这是我们目前所知道的有关蒙古与西藏宗教关系的最早文书。诏书中除了表明忽必烈及其夫人察必都已经接受灌顶,皈依佛法,并尊礼上师八思巴外,还对萨迦派僧人及其寺院作了不受损害之保证。诏书中明确谈到了“汝等僧人已免除兵、差、税、役”,忽必烈还公开表明“汝等的施主由我任之”。据说,时至今日,萨迦寺的僧人还能流利地背诵这份诏书。可见它对当时的萨迦僧人来说多么重要。

1260年,忽必烈即大蒙古国汗位,立即封八思巴为国师、授玉印、任中原法主、统天下教

门。这样,忽必烈正式确立西藏佛教为国教,以西藏僧人为通领。这一政策一直延续到元末。

1264年,忽必烈迁都大都,改元为至元,设置了管理全国佛教事务的专门机构——总制院(后改为宣政院),由八思巴领院使。是年又颁给八思巴一道诏书。此诏书在藏蒙文献中以《珍珠诏书》著称。它与十年前的《优礼僧人诏书》不同,是忽必烈以元朝皇帝身份对西藏地区各教派下达的诏书。其内容谈到:治理世道要依成吉思汗的法规,执行佛法要依释迦牟尼的教法;封八思巴为国师并让其统领所有僧众;僧人不可违背上师之法旨和佛陀之教法;懂得教法之僧人,不分教派,一律尊重服事,无论军官、军人、守城官、达鲁花赤、金字使者俱不得欺凌、不准摊派兵差赋税劳役;僧人之佛殿及僧舍,金字使者不可住宿,不可索取饮食及乌拉差役;寺庙之土地、水流、水磨等,无论如何不可占夺;僧众为可汗告天祈福等等。

我们所述这两道诏书都记载了元朝对西藏佛教的基本原则和政策。尤其后者,指明了蒙古汗廷除了使用成吉思汗时期已经形成的“札萨”(法规)之外,同时也使用治理宗教的教法。由此我们有理由认为,这道诏书是奠定元朝所执行的“政教并行”原则的最早的蒙古文献。此外,通过这份诏书,我们也可以看到,忽必烈本人与八思巴之间,采取了协调世俗君主与宗教领袖关系的可信而有效的办法,也是这道诏书的基本思想。忽必烈将国家世俗事务和宗教事务之间划定了明确界限,一经实行,遂成为元朝一代的定制。

1269年,八思巴被晋封为“帝师”“大法宝王”,另赐玉印。1271年忽必烈改国号为“元”,更加热情地支持以密宗为主要内容的西藏佛教,其中萨迦派的地位凌驾于其他教派之上。自八思巴以后,萨迦派的历代领袖多被尊为国师或帝师,许多上层喇嘛相继进入宫廷。

帝师是元代特有的制度,与国师或法师不同。国师和法师其他朝代的君主也曾颁赐过的,是赠给高僧们的一种尊称而已。所以《元史》说:“元兴,崇尚释教,而帝师之盛,尤不可与古昔同语。”帝师居住大都(今北京),而且他的住宅是在皇宫周围的“梅朵热瓦寺”(关于元朝帝师们居住的“梅朵热瓦寺”,仅见藏文文献;而在汉文文献中我们还查不到其相应的汉文名称)。

当帝师离开中原地区时必须让别人(当然是西藏萨迦派的)加以替代。据《元史》,从八思巴开始到元末帝师者十二人,其中大约七人是萨迦款氏家族的,有四人是八思巴的弟子门徒。从八思巴到元代所有帝师,都是年轻时期被委任为帝师的,有时甚至十分幼小。关于这个问题,意大利藏学家伯戴克指出:“这一点表明,帝师的候选者在宗教上和心理上的成熟,不是一个必需的要素,也不必是他们的先世师傅的转世。而且,如此的委任,应该是限制严格的一种政治行为。”(《元代西藏史研究》,昆明,2002,第40页)

除了萨迦派以外,与蒙古汗廷关系密切的应是西藏佛教噶玛噶举派。大概是1255年,噶玛派第二世活佛噶玛拔希(1204—1283)得到忽必烈的召见,1256年奉蒙哥汗之召,前往哈刺和林受到蒙哥汗和阿里不哥的崇信。元顺帝时,噶玛派第三世活佛让迥多吉和第四世活佛乳必多吉先后到元廷,得到元顺帝的崇信。尤其后者为元顺帝父子传授金刚亥母灌顶,讲解密宗法等等。这一切说明,这一教派自噶玛拔希后,一直和元朝保持联系,不过其势力不如八思巴的萨迦派罢了。无论萨迦派或噶玛派,当时都注重密宗而不注重显宗,因此西藏佛教之传于元朝者主要是密宗。

纵观蒙元时代西藏佛教在蒙古社会中所建立起来的佛陀教法,似乎只是上层阶级的信